

党群关系是同心圆

□ 祝灵君 王玉柳

在2019年岁末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如果说，党的初心使命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那么，人民群众具体、现实的利益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基数，党与人民群众是同心圆。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党是领导核心，人民群众具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就是长短不同的半径，民心汇聚初心，初心连着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初心使命确保党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合二为一，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和行动纲领。1840年以来，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从此，实现国家统一、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建立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等，客观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必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切有抱负有正义感的政治力量的崇高使命，只有那些能够代表并实现这个最大公约数的政治力量才会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承载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历史和人民最终作出了理性选择，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接受了“群众”的概念。所谓群众，即本阶级，最初是指工人和农民，后来逐步扩展到兵士、小资产阶级等。党的一大报告提出，“以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为党的中心工作”。二大党章提出，“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三大报告指出，“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党的四大报告提出，“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1928年党的六大报告提出，“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取得胜利，“群众”与“人民”的含义越来越接近。毛泽东使用“人民”的概念，也使用“群众”的概念，有时候还用“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基本可以画等号。

中国共产党代表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必然成为党群关系同心圆的“圆心”；人民群众具体的、现实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必然成为同心圆长短不同的“半径”。随着半径类别的变化，党群关系同心圆可以划分为阶层团结同心圆、政党合作同心圆、民族团结同心圆、统一战线同心圆、民族复兴同心圆，等等。

党群关系同心圆的五条定理

一是党员、干部来自群众，必须回到

群众中去。初心源自民心，初心回归民心。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把每一名党员、干部比作“一滴水”，那人民群众就是汪洋大海，一滴水回到大海永远不会干涸，一滴水回到沙漠瞬间就会干涸。

二是用协商民主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商量凝聚共识，初心变成民心。党员干部只有经常与人民群众商量，才能找到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党的各级组织越是能通过协商与人民群众达成共识，越能够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巩固领导核心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三是党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民心汇于初心，初心连着民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的理念，如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发挥好人民团体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人民代表联系人民，等等。在干部联系群众方面，有信访制度、领导接待日制度、调查研究制度、群众评议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等。在数字化时代，把数据网格与物理网格重叠起来，建立网格化治理格局，把党组织放在网心，把党员放在网格，把党的服务变成网线延伸出去。

四是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达到“最后一公里”。初心体悟民心，使命必达基层。党越能贯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越容易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最强组织力和领导力。在管党治党方面，始终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强化党支部这个基础末梢作用。比如，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科（科室）上、支部建在班（班组）上、支部建在楼（商圈楼宇）上、支部建在村（自然村）上、支部建在社（合作社）上等做法。在治国理政方面，始终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与管理。

五是同心圆收缩凝聚力量，扩张实行靶向治理。使命汇聚力量，初心谋定方向。同心圆收缩意味着党汇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同心圆扩张意味着党把这个磅礴力量释放出来，聚焦目标，实行靶向治理。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同心圆越是轻松、频繁地收缩与扩张，越容易实现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

党群关系同心圆的政治学含义

党群关系同心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敬畏体系。中国共产党视人民群众为“上帝”“眼睛”“水”“土地”“铜墙铁壁”，建构了一个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基础上的新型敬畏体系，实现了从天命哲学向人民至上哲学的成功转换。

党群关系同心圆不同于古代中国“君—社稷—民”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是指居民区的土神等祭坛或画像，稷即土谷，即祭祀品。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祭祀活动而形成的百姓聚会或集会，称为社稷。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名言，朱熹提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由于“君”与“民”经常处于断裂或对立状态，需要社稷这个中间环节实现有机联系，社稷衰，则国家亡。而党来自人民群众，又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党与人民群众不能有断裂和对立，必须不断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群关系同心圆有别于“政党多元主义”。在西方政党理论和实践中，政党只是一个“部分”，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部分”的利益，各政党之间是竞争关系。这些政党更容易关注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忽视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成为常态，难以实现卢梭所期望的“集体理性”；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看到整体、瞄准长远。

党群关系同心圆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形成磅礴力量。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磅礴力量就一定能变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源泉。



政务活动的政治美

□ 徐云涌

专家视点

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显现”，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创造美的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政务活动同样是构造美的劳动。

本文所论政务活动，仅指地方党委领导开展的议事、考察、座谈、表彰、调研、巡察、会见、餐叙等活动载体的形式安排。这些活动载体，放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起到类似“神经元”的作用，放在党的地方治理体系中，起到的则是类似“神经系统”的作用，其传导的信号、宣示的价值，极为重要。神经元间各种不同的连接和变化，直接关乎中枢功能控制系统内的整合以及大脑的运行机制。同理，地方党委领导开展的政务活动，关系到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关系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坚持和完善。

现在的情况是，“器官和躯干”的制度构架受关注较多，党委“轴心”层面的“脑学科”运转的具体制度构架受关注较少。同时，对党员干部来说，在各类政务活动中应反对和纠正什么，比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负面清单比较清楚了，但倡导和追求什么的正面清单，比如什么是正向的、什么是美的研究较少，或者只知政治、人民等大略，却不知具象的体现美的形式。为此，笔者重点想谈谈政务活动应追求怎样的政治美，以及怎样的取向是实现政务活动高质量开展的取向。显然，地方党委领导开展政务活动，都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都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大的逻辑前提下，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彰显秩序、情怀、自然、简练、流畅、迅捷的政治美。

秩序之美

一切政务活动首先应该是秩序的表达。

其一，做到“两个维护”。各个层级贯彻落实的会议，客观上是一种政治传导秩序。现在各地党委常委会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都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精神放在首位，体现的正是党中央的权威，正是地方党委政务活动对标对表的核心要义，正是“两个维护”在政务活动开展中的必然体现。

其二，照规矩办。“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系统立下开会规矩的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他的《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为什么开会、怎样开会、如何开好会作了精彩规范。当然，在所有的规矩中，最根本的是政治规矩。党的纪律、规矩都是来自实践、多次检验、反复修订形成的治理良策和必然性法则，遵从规矩也就是遵照规律。

其三，法度庄严。会议活动中，庄重严肃的会场布置、席次安排、程序设定、国歌奏唱等仪式，展现的就是庄严法度。议程的展示对于活动主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庄重感、仪式感、使命感，有助于唤起参与者心理上的重视、认同、共鸣。当然，议程需要把握尺度和边界，过了就成繁文缛节，适得其反。

情怀之美

任何一项政务活动，如果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就没有了起码的态度、温情、深刻，就毫无生机和活力可言。

一是美在态度。在态度发端上，就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周恩来1966年到邢台地震灾区慰问群众，发现露天会场上几千名群众都是面风而坐时，当场坚持改变布置，自己迎着风沙讲话。我们参观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根据地建设时期的一些图片展，就会看到在一些群众表彰大会的合影照上，地方领导基本上是在最后一排的中间，群众是绝对的“C位”并占据图片的大多数。现在有的地方陪会问题突出，为体现对某某领导的重视，甚至安排一些不相关的各层级领导参会，盲目提高所谓的会议规格，岂不知缺了人民群众的主角，将显得多么幼稚可笑。

二是美在温度。有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听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讲话的差别：前者官声官气、空洞苍白，后者为民立言、充满希望，让人感慨“一看语气情怀，就知道谁战胜谁了”。现在一些地方的座谈会，经常请的都是“有觉悟”的村干部、“会说话”的致富能人、“不乱说话”的老实人等“专业参会户”，听到的当然是没有温度的所谓基层话语。

三是美在深度。“暖男型干部”展现了美的一面，因为除了外表上看去让人舒服温暖，更重要的是能够理解和呵护群众的深层次需求。无论以何种政务活动形式，都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

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这是深度爱民、深度为民的基础。

自然之美

美学所说的“自然”，不是逻辑的“真”和“实”，而是存在的“真”和“实”，是加之于常态的主客体统一，是“情景交融”。政务活动特别是考察、会见、餐叙等，离不开“真”“实”“常”三个政治美的标准。

一是“真”。“真”具有至高无上的规律，称为真理，共产党人以赤子真心坚定信仰。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感性政治正逐渐成为政治传播的一种常态。在讲政治的大原则下应主动把一些“有料”的信息推送开来，敢于将自己的真性情和趣味直接表露。须要看到，大量的政务活动都是在“一灯和三镜”（聚光灯、放大镜、显微镜、凸凹镜）下开展的，如果不坚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的“本色原则”，领导作秀的虚假形象必定会使政务活动失效。

二是“实”。搞调研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参观、视察、一般性了解情况的政务活动，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专门的调查研究，但领导同志到基层，选取哪些考察点，考察点与考察点之间内在联系，要体现出什么政治含义，上级的决策部署要从哪些考察点中找到落实之处，或者找到问题破解关键所在，都需要落到实处。

三是“常”。在考察调研工作安排中，与部门或当地沟通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推荐给领导同志看的都是有特点的典型考察点，都是有亮点的工作。推荐干得好的典型本无可厚非，但是否有推广意义？是否一贯如此？是否代表了普遍的水准？一项工作的推进，最应该研究的是普遍的常态化的现状，看“常态”才能找出普遍性的规律。

简练之美

大道至简，简练是一种境界美。《易经》之“易”除“变易”涵义外，就是“简易”。人类用思想和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使世界尽量简化，也就是用抽象思维方式。马克思正是用这种抽象力，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呈现给世界。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政务以简为要。历来仁者之政，都崇尚简明扼要、练达有信。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推行精兵简政，有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政务活动中滋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多半是违背了为政以简的价值取向。

一是删繁就简。“删繁就简三秋树”，要有“奥卡姆剃刀”，但凡可以剔除的形式和载体，一律层层剔除，摒弃“繁琐政务”。

二是因陋就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会议由什么人主持、开场的话怎么讲，什么人讲话、讲什么话，如何结束、结束语怎么讲，也形成一套“程序八股”。须知会议本质是议事，切不可小会大办、短会长办、穷会富办，切不可把会议开得杂乱低效、“神仙”乱侃。除了法定的程序性的会议必须按程序走，其他会议活动，特别是一些座谈等交流性质的会议，应简约流程、简化仪式，直奔主题、问题导向、重点突出。

三是居敬行简。“单车欲问边”，考察调研活动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调研五不（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一竿子插到群众中间，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甚至一些调研活动也应有机地嵌入工作之中，而不是机械地在日常工作之外再安排“为了调研的调研”。当然，也应注意“行简”不能绝对化，要“居敬”，立场要敬畏，敬畏历史和人民，敬畏规则和上级，不是拍脑袋为简而简，不是对上级部署打折扣，要发挥政治领导力的“引擎”作用，实现纲举目张、以简驭繁的效果。

流畅之美

组织大型交响乐团的演出，需要各种管弦乐器相互协调高度合作，作为器乐大家族的集合，演奏者之间、演奏者和乐器之间、多种乐器之间能否实现行云流水般顺畅至关重要，一些大型政务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是这个道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历来是难题，是衡量政令是否畅通乃至衡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是协调流畅。协调流畅就是清“瘀点”、通“堵点”、解“难点”。一些涉及全局性的大型活动，无论是人员调集还是后勤保障，都需要精细筹划协商，顾及多方面的损益。

二是衔接流畅。衔接的关键点是环环相扣、不掉链子。纵向上下级单位，要目标一致、信息对称、贯通一体；横向兄弟单位，要行动相携、有无相通、节奏同步；工作不同阶段，要前后相连、步步为营、首尾相顾；还要把握动态衔接，同类问题或不同类问题，在不同单位或不同时机点的决策，就需要从时间、空间、事态中实现协同平衡。注重用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这一公共治理的“基础设施”，通过一些视频会议、信息手段，保证衔接的顺畅。

三是集成流畅。政务活动很多时候可以理解有组织、系统、条块之间的集成，各类信息、力量、预案都要集成到地方党委这个“轴心”上来。通过交流和传导各方面相关情况，包括思想观点、诉求期盼、难点关节、经验惯例、幕后力量，以及人、财、物配备构成等基础性条件，达成信息汇流，统一到一个板块之上，实现工作“电路集成”，声、光、电和谐一致，搭建畅通有序的政务活动舞台。

迅捷之美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我们的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现代化治理要因应时势，唯迅捷而已，政务活动越来越需干脆敏捷、雷厉风行。

一是应“急”迅捷。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周恩来马上中止会议赶到现场，对公安干部讲：“前清时，县大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面对突发重大事件，一把手必须亲自抓、现场抓，只有第一时间到现场，才能掌握第一手情况，作出第一等的判断，更好地临机处置。应急类政务活动，有大量的事态研判、决策困境，尤其需要迅速到场、敏锐判断、科学处置，做出全局性、果断性的决策安排。

二是应“变”迅捷。世界进入了大变局的激流，似入“无锚之境”，喧嚣烦乱之至，世界乱象折射出中国之治、东方之智是如此难能可贵。各地的政务活动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变得更加凸显和重要，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领域，还是金融、科技、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领域，都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务求棋先一招，赢得先发优势。

三是应“对”迅捷。很多事故的处理难度，常常会超出我们的经验，“对”的场合做“对”的事情殊为不易。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统筹调度、怎样稳定工作人员的“军心”，如何传递理念、怎样妥善安排前往现场，如何应对舆情、怎样把握信息发布的时度效，都要丰富的政务能力和高超的处置艺术，稍有不当，会恶化事故处置的环境，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使话语权失控。当然，也要把握好快与慢的辩证法，快是以尊重规律、符合实际为前提的快。不是所有的快都是美的好的。一味图快，羽缴飞驰，急功近利，会事与愿违，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战略意图急不得，战术实施慢不得。迅捷之目的，在于政务活动高质量开展，实现忙而不乱、快而有方、治而有效。有些事情急缓煲灸、事缓则圆。这就需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长远政治定力，“慢工出细活”，退一步而进两步。

《理论动态》第2198期要目（2020年1月10日出版）

- 专稿 •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孟 刚
- 聚焦 •
经济增速逼近6%怎么看、怎么办……………采访组
- 调研 •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精准性和实效性……………调研组
- 动态 •
观点摘编